

刘一皋▲王晓毅▲姚洋◎著

村庄内外

C U N Z I U A N G N E I W A I



北人民出版社

■四个村庄:东部农村发展的缩影

■非农经济与村庄的嬗变

■村庄利益分配的差序格局

■外来人口的冲击和村庄的回应

■人口流动:村庄的兴衰

■村庄政治:权力的垄断与分化

■国家权力与村庄的开放和封闭

村庄内外

ISBN 7-202-02989-8



9 787202 029893 >

ISBN 7-202-02989-8

F·331 定价:14.00 元

刘一皋 王晓毅 姚洋 著

D668

L76

村庄内外



A0975690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村庄内外 / 刘一皋, 王晓毅, 姚洋著. —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2. 1

ISBN 7-202-02989-8

I. 村... II. ①刘... ②王... ③姚... III. 农村-社会调查-中国 IV. 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4243 号

书 名 村庄内外

著 者 刘一皋 王晓毅 姚洋

责任编辑 杨永林

美术编辑 吴书平

责任校对 张三铁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875

字 数 202000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 7-202-02989-8/F·331

定 价 1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绪论	[1]
1. 村庄背景	[2]
2. 农村的工业化与城市化	[4]
3. 村庄的建构	[12]
4. 村庄的封闭与开放	[18]
5. 市场经济与地方政治	[23]
6. 关于本书的写作	[29]
第一章 四个村庄：东部农村发展的缩影	[32]
1. 周边环境	[32]
2. 成村历史	[36]
3. 村庄文化	[45]
4. 经济发展水平	[53]
5. 小结	[65]

第二章 非农经济与村庄的嬗变 [67]

1. 知识积累与经济增长 [68]
2. 原生型非农经济 [75]
3. 外生型非农经济 [86]
4. 企业转制与村庄集体经济的形态 [90]
5. 非农经济与村庄经济的演变 [98]
6. 小结 [102]

第三章 村庄利益分配的 差序格局 [104]

1. 非市场分配 [105]
2. 差序格局 [115]
3. 市场分配 [121]
4. 小结 [133]

第四章 外来人口的冲击和 村庄的回应 [136]

1. 外来人口 [137]
2. 成员身份与隔阂 [142]
3. 公共事务 [149]
4. 村庄集团 [155]
5. 村庄的松动 [161]

6. 小结	[165]
第五章 文化认同：难解的结	[166]
1. 利益的合作与不合作	[168]
2. 空间距离和社会距离	[173]
3. 语言与习惯	[180]
4. 家族和同乡	[184]
5. 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191]
6. 简短的结论	[196]
第六章 村庄政治：权力的垄断与分化	[197]
1. 村庄组织	[198]
2. 村庄权力核心	[207]
3. 村庄选举	[216]
4. 组织磨擦与干群冲突	[221]
5. 外来人员的政治参与	[226]
6. 小结	[234]
第七章 国家权力与村庄的开放和封闭	[239]
1. 国家对村庄的建构	[241]
2. 地方行政控制	[250]

3. 村庄控制的目标差异	[258]
4. 制度的弹性空间	[264]
5. 小结	[273]
后记	[276]

绪 论

在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正在改变中国农村原有的结构，东部地区出现了许多“工村”。这些村庄的非农产业迅速发展，农业在村庄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迅速缩小。在一些高度城市化的地区，传统的村庄已经不再存在，村庄已经几乎不再有耕地，村民全部从事非农产业，甚至他们不再聚村而居，而是与城镇居民混合在一起，原有村庄的自然边界已经消失。但是这些村民与他们相邻的居民仍然从属于不同的管理体系，作为一个社会单位的村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并没有自然消失，仍然被保留了下来，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人口的流动。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农村工业的发展，本地的劳动力远远不能满足生产的需求，中西部的大量农村劳动力逐渐进入了东部村庄的就业市场，形成了从农村到农村的人口流动。从中西部到东部的人口流动已经引起广泛的关注，但是这种关注更多地集中在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上，从农村到农村的人口流动被关注得比较少。跨区域的人口流动，不论是农村到城市，或者是农村到农村的流动，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他们都是从落后地区迁移到比较发达地区，面临着与流入地区人口融合的问题；然而，因为农村与城市的不同，迁移进入农村的外来人口也面临着许多与进入城市的外来人口不同的问题，这些进入农村的外来人口所面对的是一个村庄——一个拥有

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公共财产和复杂的社会关系的社会单位。

在这种人口流动过程中，村庄对外来人口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村庄在经济发展中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本村居民也认识到外来人口在村庄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村庄对外来人口的正式进入采取了越来越严格的限制。一方面，村民与外来人口有了越来越多的交往，村庄的经济与村庄之外的社会密不可分；另一方面，随着村庄经济实力的增强，村庄具有了更大的封闭性。村庄与村庄之外的互动构成了农村发展的一道风景，我们研究农村之间的人口流动的目的在于希望通过这项研究为观察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村庄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在本村人与外来人口的互动中更深刻地认识村庄的结构和变化。

1. 村庄背景

中国的农村工业化是在一些特定的背景下产生的，在农村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基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确地把握这种变化无疑是很重要的。我们的研究是一项经验研究，研究对象是东南沿海的四个村庄。根据它们所在的省份，我们将这四个村庄分别称为冀村（河北省）、苏村（江苏省）、浙村（浙江省）和粤村（广东省）。冀村地处京东郊区，基本上还是一个农村社区；苏村地处苏南腹地，已经被规划为武进市的中心地带；浙村位于浙江温州和福建交界处，基本上已经溶入紧邻的镇子；粤村位于东莞市的腹地，是一个较独立的、正在城市化过程中的村落。

这四个村庄在东部沿海地区比较有代表性。从发展方式来说，我国农村工业化的主要道路在这里都有所反映。珠江三角洲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以引进外资企业为主；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是

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工业化过程中两个最为典型的发展方式，前者以发展个体和私营经济为主，而后者则强调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在过去的研究中，对于华北地区农村工业化的研究比较少，但是在华北地区也发展了多种模式的农村工业化，特别是京津之间的河北农村得到了发展私营经济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市场条件。冀村地处京津之间，私营企业的发展速度很快。

如果追溯这四个村庄的成村历史，我们发现，这四个村庄都是建立在移民基础上的。粤村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单姓村，全村的人都源于同一个祖先。大约在明朝时期，他们的祖先来到这里，并在不知什么时候完全代替了这个村的原有居民。浙村的成村历史比较晚，大致是在民国时期才形成的。村庄中的居民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街上的生意人，另外一部分是从福建迁移到浙村定居的农民，在推行保甲制度的时候，这两部分人合并成为一个村。苏村和冀村都是由多个姓氏的村民组成的，但是现在村庄内第一大姓的村民都是来到村中比较晚近的姓氏。从村庄的历史上看，村庄都是随着人口流动而形成的，在形成的过程中，来源不同的村民之间曾产生了许多矛盾和冲突。村民之间的认同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在我们调查的四个村庄中，除了粤村是一个单姓村以外，其他三个村庄中的不同人群都是到了最近的几十年以来才打破原有的隔阂。比如，浙村的两部分人彼此之间的交往很少，冀村则由一条河流将村庄分成两个不同的部分。苏村的人则散布在四个较大的自然村中。

这些村庄都是因移民而形成，现在居民都是当年不同人群之间冲突的胜利者的后代。进入1990年代以后，农村又重新面临着一次外来人口的进入，对这些进入的人口，现在的村民无一例外地都采取了排斥的态度。现在的人口流动与过去的人口流动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比较外来人口，现在本村人口具有了更多的

优势，他们有更好的经济地位、更多的社会联系；更重要的是，他们具有村民身份，而这种身份得到了户籍制度和村庄公共财产的双重支持。

在过去的 20 年中，这四个村庄由于在工业化过程中集聚了财富，从而使村庄发挥了重要的职能，并导致了村庄的封闭性的提高。现在这四个村庄仍然处于变化过程之中，我们还无法就它们的前景得出最后的结论。在粤村，过去在外资企业工作的一些内地人已经开始创办自己的企业，浙村开始接纳一些周边地区的农村人口取得本地户口，尽管他们还不能享受村民的福利和待遇。苏村的集体企业通过改制拍卖给个人以后，越来越多的外地民工被企业雇用，而冀村正在将沿公路的土地作为生产用地或住宅用地转让给外来的投资者。当然，现在这些变化还不能改变村庄的结构。

现在的村庄处于变动之中，记录这个变动过程是很有意义的，但武断地下结论会导致很多错误。我们的研究试图通过对这 4 个村庄的分析，加深对处于变动过程中的村庄的理解。

2. 农村的工业化与城市化

中国农村工业化的萌芽开始于 1970 年代的农村公社或生产大队的“五小”工业，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社队企业。黄宗智在分析长江流域农村发展的时候，强调农业“过密化”的影响。他认为，正是农村工业化使农村产生新的经济结构，从而得以改变原有“过密化”的农业结构。在他的分析中，农村工业化远比农业生产责任制对农民生活的影响更大。在他关于长江三角洲农村的研究中，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农业的产量提高并不明显，但因为农村工业的发展，农民在非农业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村经济得

以发展。^①

这种理论在解释东部地区的农村发展中，可以有许多现象来证实。在这些地区，农业已经成为村庄中的边缘产业，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已经不是村庄的主要劳动力。在一些经济发达的村庄，本村人已经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将耕地承包给来自边远、贫困地区的人种植。农业的收入在村庄的收入中也不占有重要地位，非农产业成为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甚至在村庄管理中，非农产业的管理也成为最重要的职责，许多工业发达村庄的最主要领导人都同时兼任村庄总公司的经理或董事长。非农产业的经营为村庄带来了收入，同时也为村庄的领导带来了权威。从这个角度上说，近20年来农村经济的发展几乎与农业所占比例的缩小和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同步。

然而，“过密化”并不是解释农村工业发展的惟一原因，尽管相对于农村土地来说，农村的劳动力过剩，需要向农业之外寻找出路，但发展农村工业并不是他们惟一的办法，他们有许多选择来解决这个矛盾；此外，也不是农民想发展农村工业就可以发展的。农村工业化需要一定条件，不具备农村工业化的条件，农村工业是无法发展起来的。尽管黄宗智在他的研究中强调了华北地区农民通过大量种植经济作物和长江三角洲农民通过发展工副业以减少“过密化”的影响，但是农民实际上更多地采取外出的方式，寻找村庄之外的非农就业机会以减少村庄中的农业劳动力。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农民很早就开始外出务工以减弱村庄之内的人地矛盾，提高村民收入。粤村离港澳很近，从1960年代开始，私逃到香港就是农民离开土地的方式之一。由于农业的收入很低，邻近香港的一些农民就通过各种手段迁移到香港，这

^①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种现象在广东省的许多农村普遍存在。浙村的外出人口规模最大，几乎有超过一半的村庄人口被列为“特产户”，也就是户口在村庄之内，但是不从事农业生产，常年在外地一些县办或乡办的企业中从事各种非农产业活动。冀村农民外出务工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农村改革之前，地处京津之间为农民外出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一些农民离开村庄，到京津的一些郊区打工，现在的冀村所发展起来的简易房地产业还是当年农民外出时候学习到的技术。在农村改革之前，多数的村庄都有不同规模的人口外出从事非农业活动，这是对农业生产的一种补充。当年这些地方村民外出打工与现在中西部地区的许多农民外出打工的理由几乎是一样的，虽然规模和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不尽相同。

农村工业化产生于一定的社会条件，同时特定的社会条件又规定了农村工业化的进程。基于我们对四个村庄的研究，从农村工业化的产生过程看，农村工业化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原生型，另外一种则是外生型。原生型的农村工业化是由当地人起主导作用的农村工业化，而外生型的则主要依靠外来企业的进入。外生型农村工业化以珠江三角洲的外资企业最为典型，投资和市场几乎全部来自于国外，本地人只是简单地出租厂房和土地，或在外资企业中就业，近年来，甚至企业的劳动力也主要是来自内地经济发展缓慢的地区。外生型的农村工业化主要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第一是加工业的国际转移和国内政策开放的背景。随着台湾等地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业就要向劳动力成本比较低的地方转移；1980年代，中国的经济政策更加开放，从而为外资的进入创造了条件。第二是地理位置。广东省的东莞市比邻香港，而外商企业的产品多是经过香港转口，因此东莞市的外资企业迅速发展。第三是投资环境。尽管具备了比较好的大环境，但是一个村庄要吸引外商的投资，还需要创造良好的环

境，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也就是人文环境和基础设施。对于一个村庄的领导来说，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为外来的投资者创造投资环境。

对于原生型的农村工业化来说，产生一批企业家是最为重要的。尽管在东部的农村有很长的发展工副业的历史，但是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并不是工副业自然发展的结果。作为家庭经济的补充，农村工副业往往是依靠农村现有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技术往往是农民过去就有的，原材料往往是当地生产的；但是企业所使用的资源往往是外部的，如技术往往是引进的，原材料也往往是从外面购入的。在我们所调查的三个原生型工业化村庄，农村工业化都伴随着技术的进入和原材料的购入，浙村所在的镇有很长的土纺土织的传统，尽管这种传统对于浙村的工业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浙村现在的纺织印染行业却是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上的，设备是从外购买进来的，甚至有一些设备需要从国外进口，即使作为纺织原料的腈纶废料也需要从外面购买进来。温州经济发展中有一支庞大的购销员队伍，他们是联系农村工业与城市经济的纽带。苏村在历史上也是纺织之乡，近年来，纺织在家庭工业中仍然占很大的比重，但与传统的纺织业不同，现在的家庭纺织与城市经济密不可分，原料、设备甚至订单都来自于城市。冀村的工业与城市更是密不可分，无论是简易房的生产或书籍装订，城市是他们的主要用户，特别是书籍装订。在村里，只是简单地对印刷好的书籍做装订，其他的工作都在城市加工。

农村工业化是在与城市工业的关系中发展起来的，而不是传统农村工副业的自然延伸。农村工业化最为重要的是企业家的产生，这些企业家要了解外部社会。他们的观念不局限于本村，而是关注更大的市场。在三个原生型工业化村庄中，这样的企业家正在生成，他们的社会关系已经扩张到村庄之外。在冀村，一些

实力雄厚的企业家已经离开了村庄，迁移到其他地方。

随着中国农村人口的增加，出现农村劳动力过剩是必然的，但是，农村工业的发展是农村与外部的城市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的结果。从传统农村的家庭工副业发展到农村工业化，村庄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日益成为市场体系的一部分。

农村工业的发展也为人口和产业的聚集提供了条件。在过去的20年中，与农村工业化同步进行的还有农村的城市化过程，特别是小城镇的发展。过去关于小城镇的研究往往将城镇化的过程与建制镇的发展过程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将城镇化过程看作一个非农产业发展，生活方式改变和人口聚集过程的话，可以看到，中国的小城镇有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一种是村庄自然发展成为一个小的城镇，尽管可能在地方的规划上还不被承认为小城镇，但村庄的生产和生活已经高度城镇化了；另外一种是与建制镇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人口向已被批准规划的小城镇集中。

粤村是典型的第一种方式，尽管在珠江三角洲上，粤村的工业化起步比较晚，并且相对而言，规模也不是最大的，但是粤村的生活已经高度城市化了，村庄的人口，不论是本村人或者是外来人口主要从事第二、三产业，村庄内的各种基础设施也接近于小城镇。村庄与其相邻的镇的区别已经不是很大，各地来的人口在村庄内从事着各种职业的活动。随着农村工业的发展，村庄的人口增加，服务业的发展也很快。看到村庄中的一片片的工厂和商店，这些村庄已经与人们想像中相去甚远了，无论产业结构、人口聚集的规模，乃至生活方式，它们都已经很接近城镇，但在行政区划上仍然是村庄。

浙村和苏村是另外一种典型，他们在城市化过程中已经被纳入到城镇的范围之内。随着镇区范围的扩大，一些邻近城镇的村庄土地被征用，村民的房屋也被拆迁，村民与后来进入的城镇

居民居住在共同的空间中。但是村民并没有自动转为镇民，村庄的制度和村民的身份仍然被保留了下来。对于这些村民来说，与其他城镇居民的区别主要不是因为户籍制度，我们在后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在东南经济发达地区的城镇，户籍制度开始松动，城镇非农业人口与同样居住在城镇上的农业人口相比，几乎没有特殊的福利。城镇的非农业人口对农民的吸引力在降低，甚至一些过去的农民在将户口转为城镇居民户口以后，又转回到村庄中，重新成为农业人口。村庄居民与城镇居民的最主要区别在于村民还依然是村庄集体财产的所有者，因而享受由此带来的社会福利。

城市化加快了人口聚集的速度，过去的农村人口比较单一，城市化则将来自不同地区，特别是周边地区的人口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的人口的混合，人口的异质性提高，当地村民从这种人口的多样化中获得了许多利益，如他们的就业机会增加，他们的不动产的价值也提高了。随着城镇的繁荣，许多村民的住宅周围逐渐繁华了起来，一些村民可以利用自己的住宅从事商业活动，也有一些村民索性将房屋出租，依靠收取租金生活。

但在获得利益的时候，他们也发现自己必须要面对不同的人群，他们祖祖辈辈所赖以生活的地方越来越不受他们的控制，他们逐渐成为城镇居民中的一小部分。在村庄之外，一个城镇的社会体系正在建立起来，造成了村民与外部社会之间关系的紧张。

在第二种农村城市化的过程中，政府起了重要的作用。任何一个城镇的建立首先是政府规划的结果，而不是人口自然聚集的结果。政府制定城镇的发展规划，按照规划征用土地，建设城市的基础设施，并为此制定特别的人口政策。各个地方所采取的户籍制度不尽相同，但主要的目的都在于吸引周边人口进入城镇。